



中青年经济学家文库

ZHONGQINGNIAN JINGJIXUEJIA WENKU

本书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6BJY041)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 (15YJC790048)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2016M59162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项目 (41329001) 资助

中国区域聚集经济与 增长绩效研究

李 嬛 / 著

**Regional Agglomera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s in China**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中青年经济学家文库

本书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6BJY041);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号 (15YJC790048);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2016M59162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项目 (41329001) 的资助

中国区域聚集经济与 增长绩效研究

李 嬛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区域聚集经济与增长绩效研究/李嬛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 11
(中青年经济学家文库)
ISBN 978-7-5141-7522-6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区域经济-聚集经济-
经济增长-研究-中国 IV. ①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8763 号

责任编辑: 刘 莎
责任校对: 隗立娜
责任印制: 邱 天

中国区域聚集经济与增长绩效研究

李 嬛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010-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010-88191522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jjkxcbs. tmall. com](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12 印张 200000 字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41-7522-6 定价: 42.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8819151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88191586)

电子邮箱: [dbts@ esp. com. cn](mailto:dbts@esp.com.cn)

前 言

现实中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是非常显著的，并且与地区间不平衡发展关联紧密，长期以来是经济增长理论与区域经济学关注的焦点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举世瞩目成就，成为“东亚经济奇迹”的典型例证，但是整体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实现区域间的均衡发展，以东部“增长极”和中西部“塌陷区”为特征的地区间不平衡正在加速分化，这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也会成为未来我国整体高速增长的阻力。经济集聚现象的形成原因复杂多样，很多学者对于集聚经济的成因及其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然而迄今未能得到共识性的结论，我们认为这与研究方法上片面强调经验归纳、忽视演绎过程、缺乏理论支持是有关的。这一缺陷必然地降低了很多基于经验归纳的研究的价值，也促使我们尝试运用逻辑演绎探究地区集聚经济形成的内在机制，思考是什么主导和驱动着生产要素在地区间的配置。

现代经济增长逻辑中将“增长绩效”作为重塑经济地理的“无形之手”，也是评判地区的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是否匹配的核心准则。本书综合集聚经济和地区经济效率两个维度的分析，为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并引发我们对以下问题的思考：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集聚经济具有哪些特征和演变趋势？现实中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要素配置效率情况究竟如何？②普遍意义上来说，经济增长面临着投入要素的规模报酬递减和资源有限的内外双重约束。从现有的经济发展趋势来看，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否摆脱“经济增长单纯依赖于要素数量积累会因回报递减而陷入停滞”的预言？③协调地区效率与公平是制定区域公共政策的关键，也是面临的两难。这也促使我们在经济效率“无形之手”之外，

增加关于政府“有形之手”引导地区经济发展的思考：如何通过区域公共政策降低目前地区间不平衡程度，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构成了本书的研究动机。本书尝试结合逻辑演绎与经验归纳法，从聚集经济与增长绩效的内在联系出发，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提供新视角下的剖析。我们的研究思路是：首先从理论层面探讨集聚、生产效率以及可持续发展方面问题；其次从实证角度出发，考察转型期间中国聚集经济的典型事实，聚集经济的形成原因以及产业内聚集、产业间聚集和二者间协同效应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再次，考察转型期间中国地区的效率变迁与异质性，是否存在空间要素错配和效率损失，以及聚集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影响；最后综合聚集经济和地区经济效率两个维度的分析为我国区域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依据与启示。

全书共分为6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和研究结论如下：

第1章：绪论。主要对本书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围绕的核心问题、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以及创新点与不足之处进行简要介绍。

第2章：理论评述与文献述评，从本书主题出发，对集聚与地区经济发展理论中的代表性研究进行了梳理，分别围绕“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以及“地区动态增长路径与结构变迁”两条主线，对外部性与集聚以及集聚与地方经济的一些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了评述，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有待改进之处。归纳了“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集聚与地区发展的主要研究成果。

第3章：对集聚、生产效率与可持续发展进行理论层面的内在机理探究。首先，构建理论模型描述在规模经济与交易成本的权衡中，影响企业家选址的关键性因素，作为本书分析地区生产布局的微观基础，并为集聚这一空间经济活动提供内在机理解释。其次，考察多地区结构性变迁的微观基础和作用机理，从理论层面探究了空间聚集程度的变动与地区生产效率（TFP）之间的关联性。最后，构建资源约束下的动态最优增长路径模型，并将智力资本体现的技术进步对于动态最优路径的影响引入模型，考察资源约束下的动态最优增长路径是否仍然可以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第4章：中国聚集经济的形成与动态演进。本章通过对转型期间中国

区域聚集经济典型事实的描述和对聚集经济形成原因的分析,为第3章中的理论推理提供了来自转型经济体样本的实证依据,同时也为现有文献中的经典理论假说提供了相关证据。针对我国现实经济聚集形态的重要特征——地区专业化与多样性的并存共生,本章在区域综合视角下,样本选取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长周期,对我国不同聚集经济类态的协同效应进行研究,这在目前国内外文献中还很鲜见。研究结果表明,21世纪以来地区发展如果延续单一的专业化聚集模式将是难以持续的;而专业化聚集与多样性聚集的协同效应对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未来的招商引资中应注重发挥二者的协同性,将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相统一,这也是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第5章: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绩效与可持续发展。经济效率作为指挥要素配置的“无形之手”,本章的研究结果为我国地区不平衡发展的内在原因给出了解释:转型期间,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区间技术进步与综合效率比值的双向下降,导致了中西部“塌陷区”与东部“增长极”地区分化的加剧。在对地区生产效率和要素投入的贡献进行核算后发现,相对于东部地区的“内涵型”经济增长,中西部地区更具有资本驱动式的“外延型”经济增长特征。能源消耗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很高,体现出地区经济依赖于高能耗产业的带动,表明了中国未来仍需进一步转变高能耗的增长模式,实现集约型发展。在对政府“有形之手”如何引导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西部地区要素聚集对于本地区经济规模扩张具有更强的引致力,中部地区经济规模与聚集度之间具有双向循环引致关系,这一结果为制定我国的地区最优发展次序提供了政策启示。

第6章:对全书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主要结论和政策性启示进行归纳总结。

总体而言,与现有文献相比,本书对中国区域聚集经济与增长绩效的研究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创新:首先,在研究视角方面,本书综合聚集经济和地区经济效率两个维度的分析,为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新视角下的剖析;其次,在研究方法方面,本书尝试结合逻辑演绎与经验归纳法,从聚集经济与增长绩效的内在联系出发,探究地区聚集经济的形成与演进以

及评判目前我国聚集经济与区域经济增长是否匹配,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于地区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与判断;最后,研究结论的观点具有创新性,本书的实证结果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主要包括:发挥不同经济聚集类态的协同效应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不同价值导向下对于地区效率具有不同的判断,转型期间我国存在要素配置的空间结构性扭曲和重置红利,以及政府“无形之手”在不同地区的政策效应空间,最优发展次序选择,等等,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基于实证分析结论提出的新观点丰富了区域经济学理论,并且对我国区域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客观有益的参考。

目 录

第1章 绪论	1
第1节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1
第2节 问题提出	4
第3节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9
第4节 创新与不足	14
第2章 文献回顾与评述	16
第1节 聚集经济理论溯源	16
第2节 聚集经济的形成	19
第3节 地区经济的发展与变迁	33
第3章 集聚、生产效率及可持续发展：理论分析	47
第1节 中国聚集经济与地区差距的发展历程	47
第2节 地区聚集经济的形成机理	59
第3节 生产效率与要素在地区间的配置	66
第4节 资源约束下的增长与可持续性	69
第5节 本章小结	73
第4章 中国区域聚集经济的形成与动态演进	75
第1节 转型期间中国区域聚集经济的典型事实	75
第2节 中国区域聚集经济的成因分析	96
第3节 专业化、多样性及协同效应与中国经济发展	108

第4节 本章小结	116
第5章 中国区域经济的成长绩效与可持续发展	120
第1节 转型期间中国地区的效率变迁与异质性考察	121
第2节 中国是否存在要素空间错配和效率损失	140
第3节 聚集经济、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	150
第4节 本章小结	158
第6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163
第1节 主要结论	163
第2节 政策启示	167
参考文献	170

第 1 章

绪 论

“全球生产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发达省份和富裕国家。其中，全球土地面积的 1.5% 囊括了世界一半的生产活动。占埃及国土面积 0.5% 的开罗，其 GDP 超过了埃及的一半。同样，只占巴西总面积 15% 的中南部三州，贡献了全国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北美、欧盟和日本，总人口不到 10 亿人，却是 75% 的世界财富聚集之地。

但是经济活动的集中却导致了不平衡的发展。以巴西、中国和印度为例，其落后省份的贫困率是发达省份的两倍多。……这些生活在不利地理条件下的人们，每天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即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给每个地方带来繁荣，市场只青睐某些地区。因为经济发展成效卓著的国家往往不但促进生产集中，而且制定合理的使不同地区的生活标准趋同的政策。”

——《2009 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

第 1 节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方面，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显示，以当年价计 GDP 在 1980 年为 4 545.6 亿元，到了 2008 年上升至 300 670 亿元，29 年里增长了 66 倍，年均增速高达 15.55%；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后（以 1980 年不变价格折算），2008 年达到 81 506.55 亿元，较 1980 年上升了 17.93 倍，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10.86%。以当年价测算的人均 GDP 由 1980

年463元上升至2008年22698元,增长近50倍,年均增速为14.36%;排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后(以1980年不变价格折算),中国的实际人均GDP在2008年为6153.04元,较1980年增长13.29倍,年均增速达到9.68%^①,堪称“东亚经济奇迹”中的经典例证。

伴随经济总量上升的一个显著现象是聚集经济(主要表现为产业集群)的快速形成。2006年,我国产业集群总产值达到166000亿元,占同期全国GDP的78.3%^②。产业集群在总量上升的同时,区域分布不均衡的现象更为突出。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东部沿海地区作为我国产业集群最密集地区,2008年产业集群数量占全国总量超过90%;其中仅广东、浙江、江苏和山东四省的集群数量已达到2508个,占全国集群总量的54.5%^③。并且区域内集群发展的规模效应未能很好地实现。据统计,2008年我国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仅在广东、浙江两省,就有大小46个集群;纺织业在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和山东5省的集群数量更是高达87个^④。此外现有集群的结构层次有待提升,以计算机和通信设备为代表的新经济时代,以美国为例,20世纪90年代中期,硅谷所在地——加利福尼亚一个州与世界各国经济总量相比位居第7位;而作为经济发达地区之一的浙江省,2007年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制造业的工业总产值只占到同期地区经济总量的2.2%^⑤。

同时我国地区间发展不均衡问题日益突出,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大國中地区之间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⑥。由于自然禀赋和历史成因,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⑦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据统计,1980年东部沿海地区生产总值为2202.62亿元,占同期全国总量的48.46%;分别是中部和西部地区的1.69倍和2.48倍。以当年价测算的人均GDP,1980年东部地区为598.26元,分别是中部和西部地区的

①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数据计算整理。

②③ 根据《中国产业集群发展报告》有关数据计算整理。

④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产业区的发展概况与经验总结》有关数据计算整理。

⑤ 魏江等. 中国产业集群发展报告.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

⑥ 沙安文, 沈春丽, 邹恒甫. 中国地区差异的经济分析.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⑦ 1986年公布的《“七五”发展规划》,根据地理位置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正式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带,作为我国地区划分和区域政策制定的重要界定标准。

1.53倍和1.89倍。20世纪80年代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期,国家实施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战略。经过十年的改革发展,东部地区经济水平提升显著。1990年东部沿海地区生产总值上升至9 568.57亿元,占同期全国总量上升至51.26%;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差距分别扩大至1.85倍,和2.58倍。东部地区以当年价测算的人均GDP上升至2 232.68元,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差距扩大至1.67倍和1.94倍。90年代我国延续了效率优先,率先发展地区增长极的战略。在“六五”“七五”时期相关政策的助推下,东部地区在总量上继续呈现扩大趋势,到了1999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上升至50 830.28亿元,占全国同期总量的56.68%;与中部、西部地区的差距扩大到2.34倍和3.25倍。东部地区以当年价测算的人均GDP突破了万元关口达到10 800元,与中部、西部的差距扩大更为显著至2.08倍和2.45倍^①。

然而经过二十年的改革试验和政策扶持,率先发展的东部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距持续拉大,改革和发展的收益并未在中国的地区间公平分享,在此背景下,区域协调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继1999年国家出台“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陆续颁布实施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相关政策,通过投资布局和政策扶持上的倾斜,意在促进落后地区发展,以缩小地区间差距。但是政策导向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地区间差距扩大的现状,2008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为191 041.16亿元,占全国同期总量的比例上升为63.54%;与中部、西部地区的差距扩大到2.45倍和3.3倍^②。以上数据已经充分显示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东部与中部、西部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并且地区间出现极化特征。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东部地区的快速增长依赖于要素的大量倾斜式投入。以改革开放期间为例,东部地区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2 202.62亿元,上升至2008年的191 041.16亿元,年均增速达到17.28%。而东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由1980年的391.3亿元,上升至2008年的87 962.9亿元,年均增速高达21.34%,体现了投资驱动的地区经济发展模式。能源作为另一项重要的要素投入,既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同时也存在

①②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数据计算整理。

刚性约束,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能源消耗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万吨标准煤折算后东部地区占全国能耗总量的比例由1980年的43.84%,上升至2008年的49.23%,地区结构性增加超过5个百分点。而东部地区创造劳动就业机会是十分有限的,吸纳劳动力的年均增长率仅有1.21%^①。

聚集经济和地区不平衡发展作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显著特征,是要素区际流动所产生的结果,体现出我国地区发展在总量与结构方面的演变趋势。而经济效率作为地区间不平衡发展的背后“无形之手”,主导和驱动着地区间要素配置。本书综合聚集经济和地区经济效率两个维度的分析,为研究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中国如何实现区际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新的探索与初步回答。具体来说,将“时间、空间和结构”相结合,考察地区聚集经济的典型事实和形成原因;通过分析我国要素配置效率与技术进步的现状与动态趋势,探究地区发展不平衡背后的原因及演变,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供政策性启示。

第2节

问题提出

地区间经济水平差距作为地区发展非均衡在总量方面的重要特征,按照东部→中部→西部省级地区排列,通过地区劳动力的人均产值反映地区经济水平,以图1-1更直观地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差距进行描述。从图1-1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东部与中部、西部地区经济水平具有显著差异,其中东部地区表现为“增长极”,而中西部地区呈现“塌陷区”的特征,并且整体趋势来看地区间差距具有极化趋势^②。由此引发我们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东部“增长极”与中西部“塌陷区”的形成以及分化的加剧?

①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数据计算整理。

② 从图中我们注意到西部地区的内蒙古自治区自2005年以后具有上升趋势,是有悖整体趋势的一个例外,但并不影响对整体趋势的把握和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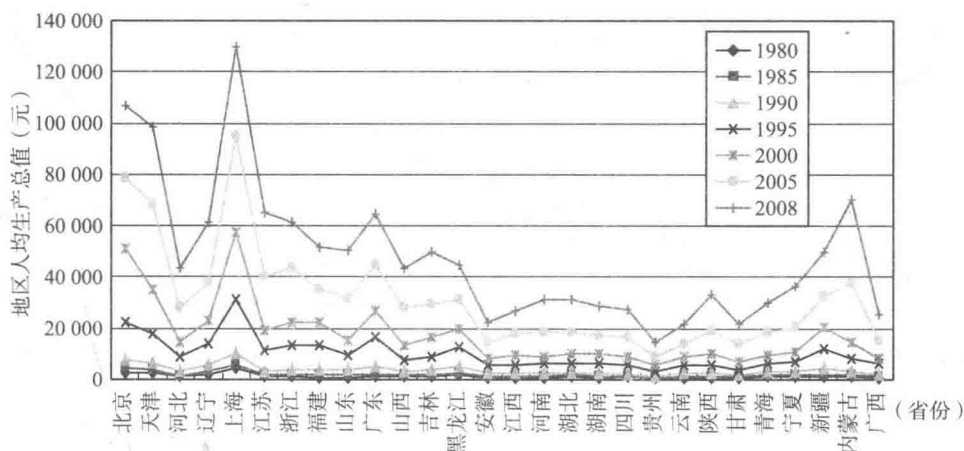


图 1-1 1980 ~ 2008 年主要年份中国省级地区经济水平差距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期。

另外，经济活动的集聚作为中国长期存在的经济现象，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此展开研究。关于中国经济的空间分布和发展趋势，现有研究的结论较为一致，总的来说中国制造业集聚程度具有上升趋势，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范剑勇，2004；罗勇、曹丽莉，2005；金煜、陈钊、陆铭，2006；赵伟、张萃，2009 等），目前由东部向中、西部的产业转移并未形成主导趋势（陈计旺，2007；陈秀山、许瑛，2008；李娅、伏润民，2010）。

对于上述结论，我们需要探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哪些因素引起了集聚的发生，进而造成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奥德里奇和费尔德曼（Audretsch and Feldman, 1996）将这一问题称为“集聚内在动因之谜”。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马歇尔（Marshall, 1920）发现了企业基于外部性在同一区位上集中的现象，并指出了产生这一现象的三个基本来源：劳动力市场共享、投入产出关联和知识外溢，称为“Marshall 外部性”（Marshallian externality）。随后韦伯（Weber, 1929）和胡弗（Hoover, 1936）在更严格的区位—成本模式下探讨相同问题。自该学说提出以后，经济学者们开始关注“Marshall 外部性”和产业集聚的关系，早期的研究大多试图以 Marshall 外部性作为分析框架来寻求解释。但是显而易

见的是 Marshall 外部性的效应全部为正,只用于描述吸引集聚的向心力。如果按照 Marshall 外部性进行推断,当地区间完全专业化是最有效的分工形式;地区间产业结构的非对称在形成空间分布的极化点时,是最优的稳定状态。显然这一理论对于中国现实的解释不具有说服力,运用该理论将无法对现实存在的地区边界和多种产业并存给出合理解释,进而否定了地区产业存在最优规模以及地区内部存在分工与结构变化的事实。

因此引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将持续到何时为止?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目前缺乏统一的框架。其中,一个研究思路是引入反向作用力。在经典的克鲁格曼(Krugman, 1991)“核心—边缘”模型中,用“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描述正的向心力;同时用“市场竞争效应”描述负的离心力。并将其进一步解释为现实中存在的两种力量之间的抗衡——使经济活动聚集的“向心力”和打破或者限制这种聚集的“离心力”。前者通过提高产业前后向关联度,带来规模报酬递增;后者由聚集地区的工资压力所造成。引入分散力,增强了模型的现实解释力,并初步回答了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将持续到何时为止的问题。“核心—边缘”模型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通过要素流动自由度揭示区际结构变迁,即对称结构与非对称结构的临界点。另一个研究思路是引入多样化用以和专业化进行比较,以探究地方专业化集聚的持续性。雅各布(Jacob, 1969)提出区位选择的多样化有利于创新和地区经济增长,称为“Jacob 外部性”。格雷瑟等(Glaeser et al., 1992)中对美国 1956 年和 1987 年 170 个城市六大产业的研究发现,地区专业化并未促进产业增长,地区竞争和多样化是促进产业增长的真正力量。支持了 Jacob 外部性,也在一定程度回答了专业化程度的边界问题。另外还有部分学者用“路径依赖”的锁定效应解释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Fujita et al., 1999)和持续性。

从实证研究出发,探讨地区集聚可持续性的一个重要视角:集聚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如何?归纳来说,一个观点认为集聚的规模经济具有累积循环、自我强化效应(Kaldor, 1981; Krugman, 1991),产业集群提高了地区竞争力(Scott, 1988; Porter, 1990),发达地区增长具有极化趋势(Perroux, 1950; Kaldor, 1970, 1981)。另一个观点认为集聚在成本驱动下实现自我修正,对地区经济具有负的外部性(Paul and Siegal, 1999;

Williamson, 2002), 发达与落后地区增长趋同 (Chatterji, 1992; 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2; Sala-i-Martin, 1996)。

理论分歧引发了学者进行实证检验的兴趣。在中国, 聚集经济对地区经济的发展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国内学者也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 然而这一问题迄今未得到共识性的结论。其中集聚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作用的观点得到了很多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 罗勇和曹丽莉 (2005) 通过 EG 指数测量中国制造业 1993 年、1997 年、2002 年、2003 年的集中度, 分析集聚与工业产出增长的关系, 结论是二者显著正相关。黄玖立和李坤望 (2006) 通过对 1980 ~ 1997 年中国省级地区制造业集中度和专业化程度的测算, 考察我国工业布局及演进情况, 并指出 90 年代产业分布不平衡程度加剧与地区收入差距同向发展。张卉、詹宇波和周凯 (2007) 将产业内和产业间聚集进行区分, 分析 2003 ~ 2005 三年间中国制造业的集聚情况, 发现中国制造业的产业聚集、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 但是不同地区存在着差异: 其中, 东部地区产业间聚集并不是提高地区劳动生产率和推动地区发展的主要力量, 产业内聚集才是主要原因; 西部地区主要依靠产业间聚集; 中部地区产业内和产业间聚集都对劳动生产率发挥影响。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结论表明集聚与地区经济发展负相关。例如, 薄文广 (2007) 选取中国 29 个省 1994 ~ 2003 年 25 个制造业样本, 就外部性对地区产业的影响进行分析, 发现在全国样本范围内地区专业化与产业增长负相关。此外, 部分研究的结论随条件变动, 例如, 薄文广 (2007) 同时发现地区多样化与地区产业的关系具有阶段性差异: 当地区多样化程度低时, 对产业增长的作用为负; 地区多样化程度高时, 促进了地区产业增长。章元和刘修岩 (2008) 在选取 1998 ~ 2004 年中国 187 个地级市进行计量检验后, 发现 OLS 回归结果表明集聚对于城市人均 GDP 具有负向作用; 当考虑到内生性, 以铁路里程作为工具变量, 2SLS 回归结果是聚集经济对于城市人均实际 GDP 的增长率有显著正的影响。

我们认为现有实证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在于片面强调经验归纳法, 而忽视演绎过程。突出的表现是强调计量模型的检验, 而模型本身的设定却存在很强的随意性, 通常缺乏经济理论的支持, 甚至违背常识, 这大大降低了经验归纳结论的价值。结合本书的研究范畴、逻辑关系和时代背景,

将现有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归纳分析如下：

首先，现有实证研究变量选取的任意性集中体现出缺乏理论框架的支撑，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很多研究没有将技术进步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纳入分析体系。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一个经济系统要实现持续的增长，就必须克服规模报酬递减，完全依赖要素积累带来的快速增长在动态转移的过程中会逐步放缓、趋于停滞；只有依靠技术进步驱动的增长才是可持续的。现实经济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质量以及资源配置效率都发挥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对于转变现有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意义重大。分析框架中缺少技术进步这一关键因素，将使我们难以对聚集经济与地区发展之间的关系形成客观完整的认识。

其次，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绝大多数实证研究的角度集中在工业制造业聚集形成的地方专业化对地区经济的影响方面。但是现实中集聚在形成地方专业化的同时，也形成了地方多样性，二者经常是并存、共生的，而且各个地区又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结构。地方专业化与地方多样性的并存是中国现阶段地区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虽然近期有研究注意到这一点，但在分析中仅就工业制造业的情况进行分析并不能有效反映地区的整体经济结构。如何在区域综合视角下将专业化和多样化合理结合，对于分析中国地区不同聚集类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特别是地区潜在的异质性变迁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思路。

再次，关于地区经济与集聚的关系方面，现有实证研究集中在由聚集经济产生的规模效应、产业间垂直关联、知识溢出等方面，即地方产业聚集形成了正的外部性引致地区经济增长。但是忽视的另一个现实情况是地区内部已有的规模经济优势很可能是促进地区聚集形成的重要因素，此时聚集经济成为由地区已有优势引发的结果。因果逻辑上的不一致，一定程度影响了现有关于聚集经济成因方面研究结论的解释力。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伴随着鲜明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特征。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反映了地区壁垒的弱化，对要素在区际间流动产生了重要影响。遗失制度变量的解释力，造成了现有研究关于集聚对地区经济作用的结论有偏，没有将制度因素有效地纳入分析框架是目前很多研究的重大缺陷。